

—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探索 —

李毅·张凤江著
LI YI · ZHANG FENGJIANG ZHU

裂变 与 选择

辽宁人民出版社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二十一

李毅·张凤江著

裂变与选择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探索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裂变与选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12
ISBN 7-5382-4648-7

I. 裂… I. Ⅲ. ①传统文化-中国-研究②现代化-文化转化-文化哲学-中国-研究 N.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498 号

裂变与选择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历史探索

李 毅 张凤江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34,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9 $\frac{3}{4}$ 插页:4

印数:1—5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顺德	版式设计:赵怡轩
封面设计:宋丹心	责任校对:刘 春

ISBN 7-5382-4648-7/I·146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目 录

导论 传统与现代：现代人思想的二律背反·····	1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与问题的提出·····	2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6
三、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界定·····	22
四、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世纪性的难题·····	28
第一章 “中国向何处去”与古今中西的嬗变·····	33
第一节 时代课题的挑战·····	34
一、“中国向何处去”的主题·····	34
二、现代化与西化·····	39
第二节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现代新儒学的 致思趋向·····	47
一、传统与现代的出路：民族危机是文化危机·····	47
二、传统的迷失：“意欲”理论的症结·····	54
第三节 “科玄论战”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61
一、东西文化交汇的产儿·····	61
二、新儒家“意志自由论”实质的批判·····	66
第二章 从“中体西用”到“中西融合”·····	74
第一节 “中体应用”思想的提出·····	74
一、时代的回应·····	74

2016/11

二、“中体西用”论思想的理论实质及作用·····	81
第二节 冯友兰、贺麟等为传统现代化所作的思想	
努力与其哲学归宿·····	86
一、以“共殊关系”为主旨的“新理学”·····	86
二、以“心物合一”为基础的“新心学”·····	90
三、以“体用不二”为架构的“新唯识论”·····	94
第三章 “中国本位”、“全盘西化”与马克思主义的	
文化观 ·····	98
第一节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思想 ·····	99
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99
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实质·····	103
第二节 “全盘西化”的文化观 ·····	110
一、思想渊源·····	110
二、“全盘西化”论的思想实质·····	115
第三节 中国的文化出路 ·····	121
一、历史的抉择·····	121
二、毛泽东文化观的基本思想与实质·····	129
第四章 从“农业化”到“工业化”的中国现代	
化道路 ·····	138
第一节 “东方文化观”的实践道路 ·····	139
一、“文化观”的核心·····	139
二、“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之路·····	145
第二节 “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质及命运 ·····	151
一、“人生向上”之理性追求的偏执·····	151
二、“乡村建设”运动破灭的启示·····	156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对“以农立国”论的思想	
批判 ·····	161
一、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与农民问题·····	161

二、马克思主义对“乡建”理论思想方法的 批判·····	168
第五章 传统论题的再认识 ·····	175
第一节 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 ·····	176
一、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现代新儒学 研究·····	176
二、国内现代新儒学研究之概览·····	180
第二节 儒学传统与现代化论题之新鲜 ·····	187
一、论题的再认识·····	187
二、寻求新的结合点的努力与探索·····	192
第三节 “儒学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梳理与总结 ·····	199
一、学术贡献之评估·····	199
二、思想分歧的焦点·····	203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新儒学与现代化 ·····	210
第一节 对立与对话 ·····	211
一、现代化的挑战与中国现代文化哲学思潮·····	211
二、对话与对立的互动·····	216
第二节 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其困顿 ·····	223
一、儒家传统与传统的现代转化·····	223
二、“返本”与“开新”的难题·····	229
第三节 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走向 ·····	236
一、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文化理路·····	236
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242
结语 ·····	248
一、“文化决定论”理论的误区·····	249
二、儒家传统的现代命运·····	260
三、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方向·····	265
附录 ·····	272

附录一	试评现代新儒家会释西学的逻辑·····	273
附录二	试析毛泽东哲学能动性范畴的特色·····	283
附录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必然抉择 ——论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295
后记	·····	307

导 论

传统与现代： 现代人思想的二律背反

现代化，是一个界定历史发展过程的范畴。马克思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自然向人生成”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也是对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辩证原则的说明。如果我们把人类生活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看作是社会发展目的的话，那么人的现代化应该是现代化的最深刻的本质。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现代化一方面必然依赖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运动的进化；同时，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又总是和人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发展、完善相伴随的。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对立统一，是我们把握现代化范畴的基本原则。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现代化过程，开始于西欧，它反映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经历的巨变。这

^① 《马恩选集》第1卷，第43页。

在一定程度上已说明了现代化的基本含义，即要以工农、科学技术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为基础。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现代化”一定要“西化”，但问题却又不是这样简单。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具体、现实、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完善，并不能仅靠工业物质文明的基础铸造而成。而且，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人在创造物质现代化的活动中往往会产生反主体性效应。^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又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构成了现代化自身发展的实质，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内涵和抉择。

可以这样说，如何在增进人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增进人的精神文明，即把优化人的创造世界与优化人类自身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不仅是涵盖 20 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核心精神，也是关涉到人类未来的主题。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并非是今天的自觉，从近代以来，实际上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现代化的运动，使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七十多年，我们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间我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反帝任务，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而且，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们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更令世人瞩目。但是，由于历史上几次出现的严重失误和挫折，已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大大

^① 即人作为主体的活动不但未能取得提高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地位的效应，反而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应。参见陈曼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哲学》第 38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落伍了。当人们推开窗户，放眼远眺时，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们在物质上文化上，仍然是一个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家，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严峻的现实不得不引发人们深刻而广泛的历史反思。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与走向世界，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感愈发沉重。实质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越大、越快，这种民族危机感也就愈强、愈重。这样的反差效应，迫使人们怀着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急切地探求造成我国贫穷和落后的历史原因，并积极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

历史的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复性。与“五四”时代相比，80年代的“反思”也是引发于我们物质上的贫弱，70年了，这依然是我们的主要问题，“古今中西”之争仍是80年代“反思”的思想背景，只不过这时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想体系的对垒更加明显和激烈。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生的。这一切，实际上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等物质现代化方面都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由此，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如何表现？人们在対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深刻体会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强大物质现代化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只能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而“抓革命、促生产”的思路，也只能使社会主义走入歧途。社会主义不仅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而且也应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这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围绕着“中国如何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在一段时期内，广为流行的“彻底重建说”，主张彻底抛弃“黄色文明”的巨大包袱，全面引进海洋的“新的世界观”。这种观点，把文化发展视为一整体，认为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是铁板一块。所以他们所谓“重建”不过是全面“移植”。

痛感中国落后、文明的衰败，从而要求学习西方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孜孜以求的事情，也仍然是摆在今日中国思想界面前的急迫任务。但以“全盘西化”为核心的“重构说”，并非今日首创。历史证明，“西化”观点作为一种振聋发聩的口号，确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它企图割断实际上根本无法割断的文化传统，所以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实际，它既不能说明现在，也会失去未来。因而从未曾有较好的命运，大多以“浮躁的喧嚣”、“枉然的追求”而烟消云散、寂然无闻。

在今天社会主义现实的条件下，“西化”论多以明确的政治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遭国人唾弃。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已决不允许我们走回头路，对此，绝大多数人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彻底重建说”截然相反的观点，是方兴未艾的“儒学复兴说”，即新儒家思潮，他们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求中国现代化的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这一思想流派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延续了七十多年，至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并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鼎足之势。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是体现中国文化发展的纵横交错思想斗争的三种主要思潮。70年来，三派之间针锋相对，长期论辩，其焦点是“中国向何处去”。三派思想的发展，都表现出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种自觉认识，但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

从理论上讲，新儒家大多是在饱受了西方欧风美雨的打击

之后，重提“儒学复兴”的，具体地讲，新儒家学者大都是在感受到了西方物质文明发展的创痛之后，在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中寻求“救治”之方的。他们的创痛愈深，对于儒家思想传统的“信念”就会越强。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物质生活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冲突与对立，认为人的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决非大工业和的物质财富的积累所能解决。事实上，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已提出了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科学与哲学、必然与自由等关系的问题。他们对人类精神的重视，以及对于确立人的主体性的理论阐述，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人类 20 世纪以来发展的趋势，这也是它具有持续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与此相联系，新儒家主张以儒家“道统”为民族精神的主要内涵，并提出调整民族精神、心理文化结构，以使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的观点。就此而言，新儒家远较“西化论”的观点深刻，尤其他们在吸收西学以中国化方面的努力，其思想史的功绩不可没。

从现实上看，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似乎也并非如“西化”论那样，流于空谈。他们多以近些年来东亚经济的腾飞，作为其理论的实践证明。这也是“儒学复兴”说能“复兴”的主要原因。所以，新儒家把“儒家”思想称为人类未来的“定盘针”就成了应有之义了。

应该正视的是，现代新儒学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实践中一种不可轻视的思想潮流。新儒家注重的“民族特色”、“民族精神”等理论特征，“批判继承”、“创造性转化”等口号，以及平等“对话”、建立“健康互动”关系的主张等等，对于正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来讲，都具有一定程度“一致”、“符合”的迷惑性。

中国的现代化，已成了一种客观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由贫困落后走向富裕文明，由农业社会步入

工业社会是一个整体的运动过程，伴随着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同时出现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的变化，注意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人的精神文明，将物质生活的改善同人的理想境界的提高统一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的核心标志，贫穷愚昧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提高，精神生活却陷于困惑迷茫、危机，更不属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应该是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①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早启动，始于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后，由清廷中的洋务派发动的模仿西方先进兵工技术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由于认识到西方列强东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最早产生了应变的思想。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在对现代世界具有初步朦胧认识之后，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一种指导思想，这种自变、自强的思想可说是中国的现代化思想的最早萌芽。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中认识世界的大变局和中国的大变局的。“自变”、“自强”思想，都源于《周易》的变易观和儒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此来认识中国器用层次上的改革，他们向西方学习是在排外、非外的心态和思想情绪支配下被迫进行的。当时不论封建顽固派还是洋务派，都认为国家的根本即传统体制是不能动的。它基本上属于一种消极的“防卫性现代化”思潮。

自强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

^① 参见《马克思全集》第46卷（下）35页。

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于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对当时的现代化运动起到的作用，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体西用”论的思维方式，确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很难摆脱的一个阴影。就理论本身而言，所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① 这种说法，实际上具有着极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极为深厚的心理基础。这种文化背景就是“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已有数千年历史矣。从而这心理基础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特有的“爱国的自大”^②！从这种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础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两种典型态度。一种是：所有外来文化归根结底都源于中国：“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③ “究之泰西之学，突出于中国，百家之言藉其存，斑斑可考”^④，只要一考，则一切近代自然科学也就无不是“中国所固有之，西人特踵而精之”而已^⑤。总之，中国人是“能之而不为”，因为“技艺微长，富强谋术，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又何所取”。^⑥ 另一种也是更普遍的则是：“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第48页。

② 鲁迅：《热风·三十八》。

③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序》。

④ 《翼教丛编》卷五，《湘学公约》。

⑤ 江衡：《崇尚西人之学辩》。

⑥ 黄仁济：《黄氏历史记》。

制度、文章，则复然出于万国之上”，^①“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以忠敬为美，……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②所以“吾国固有之文明，正是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③西方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正要等到中国的文化来救”。所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④归根到底，全人类、各民族最终都要踏上“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⑤

以这样的思想文化为背景，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很难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定式。

自强运动的失败而后有维新运动，从变革技术到要求变法，从器用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的改革。当时最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公开提出效法俄皇大彼得和日本明治天皇实行变法。这表明当时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对中国现代化开始形成初步的改革方案。但即使康有为也还是在“托古改制”的思想格局内革新，没有摆脱旧的儒学规范。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其变法图强的出发点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下引进西方的器用。

① 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

②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③ 詹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十二卷十号。

④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维新运动已经失败了。革新之士逐渐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单靠西学来补一下是不行的，必须做根本的改造。随着办工厂，兴实业，派遣留学生出国，翻译西方著作，西方传入的新思想开始在中国发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变化。这就是西方的社会进化论输入中国。这样，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变易观逐渐被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观所代替。这可说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真正迈出了一大步。

严复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翻译《天演论》的。他把达尔文进化论改造成崭新的思想方法，把生物进化论改造成“救亡哲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

作为我国近代感觉敏锐的思想家，严复把近代科学的思想方法看成是“富强之源”。所以他在介绍进化论的同时，也介绍和翻译了形式逻辑。他把逻辑学称之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①而这正是我国旧学所欠缺的。所以严复所阐述的进化论，以及他介绍的逻辑学，一时使我国思想界耳目一新。严复所译的《天演论》一书出版后10年光景，该书就成为当时中学生喜爱的读物，足以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探求现代化道路与理论饥渴的程度。《天演论》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上产生了深刻影响。

胡适在《自述》中描述说：“《天演论》出版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入，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

^① 《严复集》第四册，第1028页。

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之士的‘口头禅’”。^①

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激进的革命派提出了种族革命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接受了达尔文、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边沁等人的社会政治学说，与其师康有为的保教尊孔思想逐渐分道扬镳。梁氏曾致书康有为：“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多，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②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十几篇《新民说》。该文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氏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现代世界意识、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自由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虽仍借用《大学》新民之义，但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的特征相比较，有许多观点是相吻合的。^③胡适后来回忆说，《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的民族、很高的文化”。^④

① 《胡适自传》，第46~47页，黄山书社1986年。

② 1902年5月致康有为，《梁启超选集》第3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346页，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 见《胡适自传》第49页。